

学术界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简军波

2023 年 2 月



APLN

ASIA 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作者简介

简军波，现任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主要从事中国外交、欧盟政治和国际政治方向的研究。他著有《权力的限度：冷战后美国霸权合法性问题研究》和《非洲事务与中欧关系》。他也是《中国对欧投资：基于政治与制度的分析》、*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的编著者。他曾于 2018-2020 年担任中国驻欧洲国家的外交官，也曾任杜伦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奥尔堡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担任访问学者。



@APLNofficial



apln.network



@APLNofficial



@APLNofficial

亚太核不扩散和核裁军领导网络（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简称 APLN）是一个由亚太各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导人组成的机构，致力于应对安全和国防挑战，着重应对和消除核武器风险。

© 2023 简军波

本报告的发布严格遵循 4.0 版国际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本次项目经费由纽约卡内基公司赞助。

本文所载观点仅为作者自己的意见，不一定反映作者所属机构、APLN 及其员工、董事会或资助方的意见。

如有任何咨询，请直接转至：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APLN Secretariat

4th floor, 116, Pirundae-ro;

Jongno-gu, Seoul, ROK, 03035

Tel. +82-2-2135-2170

Fax. +82-70-4015-0708

Email. apln@apln.network

本出版物可在 www.apln.network 免费下载。



封面照片: iStock/William_Potter

学术界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简军波

国际关系学者的地位十分独特，他们的工作可以被用来左右公众舆论或影响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想法。许多人还直接担任政治决策者的顾问，或通过二轨对话参与外交事务，成为对官方正式外交的补充。¹ 理论上讲，学术研究应该立足于探索真理和客观事实，不应服务于特定政治团体的利益。但是，国际关系学者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立场，往往会使他们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独立性复杂化。这一点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尤为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评估学术交流状况，探讨学者发挥的作用如何影响双边关系，并思考学者可以如何改善两国之间令人忧虑的关系。

中美学术交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对中美学术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主要存在四个挑战：官方对学术交流的限制、民族主义对研究的影响，学术交流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中文在中美学术交流中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中美两国的国内政策限制了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缩窄了沟通渠道，也不利形成正常交流的气氛。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当局对一些在中国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美国学者展开调查，并加大了对在美工作的中国学者的审查力度，包括那些参加中美联合研究计划以及与美国学者进行过交流的学者。² 这些都对双边学术交流产生了寒蝉效应。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前科学政策高级顾问 Kei Koizumi 指出：“部分美国科学家现在认为，不值得冒着

1 Otto Federico von Feigenblatt, “Flexible Diplomacy: Scholars as Key Players in Track II Diplomacy”, *Espirales Revista Multidisciplinaria de investigacion*, 2019, 3, 28, 32-45.

2 Emily Feng, “China tightens restrictions and bars scholars fro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NPR*, 2022年3月30日, <https://www.npr.org/2022/03/30/1089631713/china-tightens-restrictions-and-bars-scholars-from-international-conferences>.

被调查的风险与中国研究人员展开合作，而[...]一些中国科学家可能也有同感。”³ 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两国学者之间的定期互访活动也被迫中断。受疫情以及中美政治争端和矛盾的影响，过去五年内双边学术交流越发罕见，沟通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令人心灰意冷。

学者也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削弱了他们进行客观理性分析的能力。在学术研究中，意见不同是正常且可取的现象。但是，如果学者带着民族主义偏见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就会丧失必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北京大学校园 (iStock/bingdian)

3 Andrew Silver, “Scientists in China say US government crackdown is harming collaborations”, *Nature*, 2020年7月8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015-y>.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句名言在中国学术界家喻户晓。⁴ 中国学者普遍被要求应当胸怀祖国。当然，热爱自己的祖国并没有错，但对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技能来处理学术中立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们研究的客观性就会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美国学术界以其客观、中立和理性的传统而自豪。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软实力理论（Joseph Nye）、新帝国理论（Walter LaFeber）和霸权稳定理论（Robert Keohane）均由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所建构，并通过使之合法化的手段来捍卫美国霸权。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有关如何“击败”中国、或与中国“竞争”“抗衡”的文章屡见不鲜。⁵

当然，学者以公民身份为国家服务，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他们仍然必须坚持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原则。更重要的是，学者必须挣脱民族主义的枷锁，因为民族主义会导致其偏离自身职业的基本规范。当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侵蚀时，两国学术交流的基础也会逐步遭到破坏。

此外，公共辩论的两极分化也使得学者很难自由地讨论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者都无法完全自由地讨论所有话题或提出各种观点。在美国，中国的政策或行动被贴上“极权主义”、“战狼外交”、“债务陷阱”、“侵略”、“侵犯人权”、“种族灭绝”和“威胁”等污名化的标签，使越来越多的专家对中国保持沉默，以免遭受公众批评。如果说试图用务实和灵活的方式来处理中国事务的智库专家在美国已经被“边缘化”了，则有些夸张，⁶但对中国持相对中立态度的美国专家似乎现在越来越少在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有关双边关系的评论了。相反，那些对中国持鹰派态度的人似乎更经常发表各种言论。

4 孙亚慧：《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新华网，2021年6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6/09/c_1127544365.htm。

5 例如可参见：Richard Fontaine, “Taking On China and Russia: To Compet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Pick Its Battles”, *Foreign Affairs*, 2022年11月18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aking-china-and-russia>; H.R. McMaster and Richard Scheinmann, “U.S. Restraint Has Created an Unstable and Dangerous World: Decades of ignoring the menaces posed by Russia and China has led the West to a precipice”, *Foreign Policy*, 2022年6月17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6/17/us-military-strategy-geopolitics-restraint-russia-china-ukraine-war/>; Richard D'Aveni, “The U.S. Must Learn From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to Beat It” *The Atlantic*, 2012年11月6日，<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2/11/the-us-must-learn-from-chinas-state-capitalism-to-beat-it/264552/>。

6 李海东：《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成巨大讽刺》，环球时报，2022年8月2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94IVFCL1VD>。

在中国也有类似问题，目前学者不太愿意讨论中国如何与美国减少冲突并提升合作的具体构想，因为他们害怕遭到部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同时他们也担心，如果他们表达出关切，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中国官方政策不必要的争论或误解。因此，双边学者都被 Lance Gore 所称的“政治正确”所左右；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由主流公众舆论塑造而成，以对另一方的鹰派程度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正确。这种态度不仅妨碍正直的学者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独立研究，还会怂恿不够严格谨慎的学者迎合负面的公众情绪或特定的政策制定者；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形象，也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Gore 曾哀叹道，在一定程度上，“反华”和“反美”在各个国家变成了政治正确的立场，迫使很多学者进行自我审查，以免招来麻烦。⁷

语言能力的欠缺是中美正常学术交流的另一个长期阻碍因素。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学者并未能很好地掌握中文。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状况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传统汉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拥有深厚的语言学知识，甚至可以阅读和理解复杂的文言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已经被“中国研究”所取代。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增长，美国专家更关注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和外交政策，而非中国语言、历史和传统文化。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专业发展迅速且多样化，但语言技能的欠缺会导致美国学术界难以直接获取中文资料，译文也有可能无法呈现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美国大幅减少境内孔子学院的数量，抑制汉语人才的培养。好在包括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在内的一些美国组织正在努力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⁸

当然，上文罗列的种种问题，并非意味着中国的美国问题学者（或广义上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自身不存在语言问题。总的来说，语言依旧是中国大学区域研究院系的弱项，

7 Lance Gore, “The curs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China and the US”, *Think China*, 2022年3月24日, <https://www.thinkchina.sg/curse-political-correctness-china-and-us>.

8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Chinese Language Fellowship Program; 2019, <https://iclp.ntu.edu.tw/tw/upload/download/files/caebaf3d92216d7c4ba03b972a2c9e5a.pdf>.

不过多数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至少已经掌握了英语。但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国之间学术刊物和信息的交流相对有限。中国学者对美国问题的了解没有想象中的多，部分原因是有关美国的书籍和文章相对少地被翻译成中文。一些学者也倾向于依赖数量有限的译著或二手资料，部分是因为谷歌作为最有效的学术研究搜索引擎之一，没有在中国提供服务。此外，虽然很多中国大学的图书馆订阅了国际学术数据库，但可访问的数据库以及订阅这些数据库的大学数量都不太多。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学者没有在美国开展实地研究。这可以归咎于中国的研究实践：20 世纪 80 年代开设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学科时，几乎没有可供开展实地研究的资金。虽然现在获得经费资金相对容易，但旧的研究传统仍沿用至今。总而言之，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总体水平较低，但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不同的是，这与语言能力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信息相对匮乏和研究实践缺乏有关。⁹



iStock/ BrianAJackson

9 Ma Jun, “‘Our American studies are too weak’: Chinese scholars warn of knowledge gap with US pe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1年5月23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34371/our-american-studies-are-too-weak-chinese-scholars-warn>.

如何恢复中美学术交流的活力？

不言而喻，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即使学者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对话依旧提供了交流和分享意见的机会，且可以帮助学者找到哪些地方存在误解，并让他们将这些见解带回自己的学术社区。为此，中美学者必须就如何恢复正常的学术交流达成一些共识。达成共识意味着要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保持中立和客观立场，并在各自的事实调查工作中保持高度严谨性。然而，由于双边政治关系恶劣，学者很难完全摆脱民族主义思想和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因为作为个体的学者，他们也必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生存。不过，参加中美学术交流的学者却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来提高交流质量。

首先，学者应当本着解决冲突的原则来进行交流沟通。如果双方学者均认同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就可以努力促进中美之间的和平。他们应当着重于相互和解，而不是通过迎合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故意加剧双边紧张局势，从而提升个人声誉或获得经费。例如，两国学者不应侧重于问题的对立立场或对抗性政策，也不应着重讨论一个国家该如何击败、抗衡另一个国家，或与之展开竞争。相反，学者应当关注如何缓和紧张局势，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

如果多数学者都遵从这一建议，那么他们的学术研究就有可能被中美外交政策制定者用来解决争端。中美两国学者联合编著的研究报告，有助于营造利于达成和解的氛围。

其次，在无法消除分歧的情况下，学术交流应以达成共识为主旨，努力求同存异。显然，中美在很多战略层面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若一直强调这些分歧，只会在其他层面引发更多分歧。因此，如果学术界要在促进双方和解方面发挥作用，学术交流就应该侧重于消除分歧，而不是放大分歧。或许有人会说，直面矛盾是解决矛盾的第一步。原则上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存在太多矛盾，那么直面矛盾只会引发更多矛盾，因此最好是要先完全无视它们，从寻求其他问题的共识入手来促进改善关系。换句话说，即使解决冲突的时机不对，但仍有机会维持稳定。

例如，双方学者不可能在解决台湾或南海问题的分歧方面达成重大共识，但他们可以开展联合研究或共同举办国际会议，讨论一些相对更容易解决的双边问题，如解除旅行限制或投资问题，抑或解决双方有着明确共同利益的复杂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学术交流中采取的“求同存异”的方法，或许为两国建立政治互信提供了一些启示。在解决很多全球性问题时，中美两国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也必须互相帮助来解决各自的内部经济困境。若学者能够着眼于共同利益，谋求在相关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即使是微弱的共识，也会摆脱冲突的敏感性，营造出合作氛围。两国学术界之间的互信，可以逐步转移至各自社会和政府层面，进而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

第三，有必要让更多的亚太学者参与学术交流。中美关系的改善，关系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地区学者不应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参与涉及中美关系的学术交流，避免对中美关系和地区事务发表偏颇的看法。或许有些地区学者不愿意讨论双边关系，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激发中美产生更多争端。但是，如果有更多地区学者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就有助于促进中国、美国和整个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它也可能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地区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候。作为第三方国家的学者，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表达自己对地区安全和繁荣的看法。

但和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一样，亚太地区第三方国家的学者也应致力于促进达成共识和实现地区和平。在公共学术论坛和媒体上，他们不应重提历史和主权问题，而应针对潜在的地区合作提出建议。简而言之，亚太学者可以在各国之间寻求共识，找到应对共同挑战的解决方法和合作方式，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体”或“家庭”的意识。这有利于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改善整体区域关系。



中国上海——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推行新的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措施后，人们在虹桥火车站的固定核酸检测点排队等待新冠肺炎拭子检测。2022 年 12 月以来，中国已解除了大多数限制措施。（图片来源：iStock/anilbolukbas）

如何通过学术交流来改善中美关系，促进亚太地区稳定？

双方应当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促进中美恢复正常学术交流。

首先，要简化签证申请手续，解除旅行限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之间的航班大幅减少，且费用极其高昂。此外，两国相互发放的签证数量已经减少。这些措施给双方的学术人员交流以及宝贵的面对面谈话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此类障碍不利于中美之间正常的学术对话，也阻碍了两国学者促进关系友好发展的机会。虚拟对话和线上会议永远无法取代面对面交流。双方应积极鼓励旅行，这将有效打开学术交流的大门。鉴于中美关系恶化的风险大于疫情风险，且后者的风险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中美两国政府应该磋商建立更高效的签证申请程序，增加长期签证发放数量，做好逐步恢复正常航班的准备，以此支持后疫情时代的学术交流。在撰写本报告时，中国取消了普通公民的海外旅行限制，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其次，允许双方更多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流，不要施加额外限制。

开放旅行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解除对学术交流的限制。在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压制与中国的交流，对正常的学术工作造成了伤害。正如一位专门从事美国教育政策研究和实务的教授所说的那样，“很多美国研究人员因为害怕被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起诉而放弃了与中国的

联系。”¹⁰幸运的是，这项始于2018年的行动计划于2022年终止，但余波犹存，不容忽视。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报告的其中一位美国作者指出，“美国决策者必须牢牢掌握用于遏制双边技术相互依存的各种不同工具。”¹¹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切断两国之间的社会科学交流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正式内容。两国的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学者应该就如何保障地区稳定和促进合作提出看法，这将有助于为改善中美关系营造良好气氛。学术界和学者的成就，不应成为政客恫吓或干涉对方的工具，而应该用来稳定双边关系和维护地区稳定。

第三，两国学者、智库、研究机构 and 大学应致力于讨论全球问题，寻求中美合作空间。

应当在两国出版有关全球问题双边合作的学术讨论成果，因为以这种方式共同提出的务实方法可以激励政策制定者为中美合作寻找切实可行的机会。如上所述，为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双边学术交流可以从讨论全球治理合作入手。鉴于学者更有可能体谅另一国的同行，因此联合研究可以减少对红线和政策意图的误解。组织联合研究项目，对接中美两国学者，让他们开展对同一个主题的研究，这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讨论的主题可以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短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维和、生物多样性、海洋环境治理和减少贫困。这些主题的讨论，更容易促进两国学者之间形成共识。研究人员及其所属机构还应精心制定媒体宣传策略，这样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意识，有助于为中美关系营造友好气氛，这或许也能启发政策制定者找到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方法。不管怎样，讨论解决全球性问题，总好过讨论台湾海峡、新疆问题或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霸权行为等争论不休的话题。

换句话说，讨论合作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双边问题，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有利于和解的气氛，并为未来真正的和解与合作奠定基础。此外，通过坚持不懈地接触制定者和广大民众，这些学术交流也有望产生两国政府可能感兴趣的可行的合作建议。

10 Holly Chik, “US scientists keep ties with Chinese peers despite crackdown: research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2年7月21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186122/us-scientists-keep-ties-chinese-peers-despite-crackdown>.

11 Jon Batema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2年4月25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Bateman_US-China_Decoupling_final.pdf.

第四，两国学者应该建言献策，绘制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愿景。

中美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两国各自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看法。美国学者过于关注维护和扩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中国学者则过分强调多极化和国际秩序的公平性。因此，两国学者应通过学术交流，努力就未来国际秩序达成共识。这样的共识不仅能考虑到中国崛起，也维护了美国对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愿景，从而避免双方因为对世界发展格局存在不同想法而加剧冲突。

当然，针对国际秩序的性质达成共识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两国心目中理想的国际秩序非常不同，中国学者通常被要求为他们的“祖国”服务，而美国学者则有意识地（有时是无意识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然而，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国际秩序的性质上至少存在一些共同的理念。作为联合国的两个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是《联合国宪章》和其他重要文件的共同发起者，而这些文件对于二战后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两国均认同有必要促进全球稳定、经济繁荣、主权平等原则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人权。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共同理念，远比想象的要多。有鉴于此，两国学者应能找到某种方式来讨论更好的国际秩序，并提出中美两国怎样能够通过合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建议。

第五，应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由学者、政策制定者和观察人士组成的稳定的合作网络。

着眼于整个亚太地区利益而非个别国家利益的讨论，也能为区域和平勾画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亚太地区的学者应该将亚太地区视为一个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冲突地区。要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就应努力团结那些致力于实现区域治理、和平与稳定的学术团体、政策制定者和观察人士，共同组建一个更广泛的亚太学术网络。这个网络应该鼓励地区学者参与讨论亚太事务，并通过共识宣言、声明或学术研究，为促进中美和解与合作以及地区稳定与繁荣提供更广泛的思路和途径。幸运的是，亚太领导网络（APLN）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一些组织已经将学术团体、政策制定者及观察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地区和全球秩序与治理。这些网络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让学者在稳定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举办学术网络研讨会或研习会时，这些网络应当注重连续性，帮助参与人员相互结识，逐步建立信任关系，也能够促进更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

结论

当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不应夸大学术工作和学术交流对改善两国总体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基调是由两国领导人和外交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我们还应注意的是，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学者扮演的角色不同于美国同行，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学者的专业和社会角色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用也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发挥作用，共同促进中美关系和解和地区稳定，将成为来自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亚太学者面临的一个挑战。

除了参与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学者也有责任帮助各自国家的政府开展稳健、合理并以和平为导向的国内政策讨论。

中美关系的演变，影响着学者在促进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幸运的是，两国政府均宣称他们希望管理好两国之间的竞争，防止从竞争滑向对抗。这有益于建立互信，反过来也将改善双边学术交流的前景，让学术界发挥更大作用，理想情况下还将形成改善双边交流的良性循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强化学术交流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官方交流陷入僵局时。尤其是在这种大多数公众似乎更倾向于互相仇视的时刻，学者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和解。来自中国、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学者必须积极寻找机会，与他们的同行及各自国家的政治人物进行交流，以减少中美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

除了参与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学者也有责任帮助各自国家的政府开展稳健、合理并以和平为导向的国内政策讨论。

APLN 中-美-亚对话

中美关系已严重恶化，且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由此产生的安全困境正在助长恐惧情绪、不信任感和军备竞赛，影响着亚太地区和全球各国。潜在影响包括军事对抗和核升级的可能性，同时破坏全球合作应对 21 世纪一系列挑战的努力。

APLN 的中-美-亚对话项目通过一系列学术交流和出版物，评估了增进理解、减少误解、降低风险、缓解紧张以及建立信任所需的步骤。该项目旨在为亚太地区尤其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决策者及其政策共同体设计务实的政策建议。

亚太核不扩散和裁军领导网络（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简称 APLN）总部设在首尔，由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导人及专家组成，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特别关注降低和消除核武器风险。

APLN 的宗旨是提供信息和鼓励辩论、影响行动，并提出旨在解决区域安全威胁的政策建议，重点在于核威胁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并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遏制、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



ASIA-PACIFIC LEADERSHIP NETWORK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apln.network



[@APLNOfficial](https://www.facebook.com/APLNOfficial)



[@APLNOfficial](https://twitter.com/APLNOfficial)



[@APLNOfficial](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PLNOfficial)